

走向南宋： 北宋后期文化与词风演进

——以贺铸、周邦彦为考察中心

Zouxiang Nansong: Beisong Houqi Wenhua yu Cifeng Yanjin
—— yi Hezhu, Zhoubangyan wei Kaocha Zhongxin

符继成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走向南宋： 北宋后期文化与词风演进

——以贺铸、周邦彦为考察中心

符继成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南宋：北宋后期文化与词风演进：以贺铸、周邦彦为考察中心 / 符继成著. —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687-0260-7

I. ①走… II. ①符… III. ①贺铸(1052-1125) — 宋词—诗词研究②周邦彦(1056-1121) — 宋词—诗词研究
IV. ①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1931号

走向南宋：北宋后期文化与词风演进

——以贺铸、周邦彦为考察中心

符继成 著

责任编辑：王正杰 邓江爱

装帧设计：李 平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省湘潭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电 话：0731-58298960 0731-58298966（传真）

邮 编：411105

网 址：<http://press.xtu.edu.cn/>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880 mm×1194 mm 1/32

印 张：9.75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7-0260-7

定 价：28.00元

序

与继成的师生缘分，起于一次颇费踌躇的招生录取。2004年，我评阅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试卷，当时湖南师大的古代文学招生是统一录取，再根据复试情况以及本人要求分先秦汉魏六朝、唐宋及元明清段。继成的试卷优缺点都比较明显，所以给我留下了印象：他答题不像一些本科生对教材亦步亦趋，而是时有自由发挥，但基础知识和理论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复试那天，在考生自我介绍后，我才将名字与真人对上号。在交谈中得知，他唯一的正规学历就是中药学的中专生，后来靠自学拿到汉语言文学的本科文凭。于是我心里禁不住有点犯嘀咕：这样的经历未免与古代文学离得太远，基础不牢又如何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但他在回答问题时的那种简洁和流畅，那种谦和中的沉稳和自信，那种自然流露出来的对唐宋诗词的热爱，又让我另眼相看。联想到自己也是没有正规大学文凭，经过多年苦学才考上研究生，一番沉吟后，我决定收下这个从大山里出来的湘西伢子。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犹疑，我很高兴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继成读研时虽然年龄偏大，专业知识积累不够，但他在中专毕业后的工作期间，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名著，且创作、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文学素养颇佳，不“专”而能

“博”，善感而能写。他的非“学院派”出身，则使他能够不拘于成见，在学习学界前辈、大师的论著时，既能以敬仰之心认真研读，也能抱独立之精神思考、质疑。虽然他的质疑未必尽是，但这种精神，我认为是治学所必不可少的。古人曾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继成性格笃实，却学而能疑，因此可以轻松“悟入”，长进很快。而我们师生之间，也常有辩论性质的交流，得教学相长之乐趣。

硕士毕业后，继成由于家庭原因，曾一度打算找工作。也许是求职艰难，更因为他在转了一圈之后，还是放不下他所钟情的书斋研究，于是重新打算考博。而我所招博士，出题、阅卷、复试、录取，均由其他老师完成，我一概不参加，倒不是为了避嫌，而是想看看我的考生们适应能力究竟如何。结果，继成就成了我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而这本书稿，则是他的博士论文修改稿，是他跟从我读博数年学习生活的一个总结。作为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我认为本书具备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视角新颖独特。南宋词与北宋词的差别，自清初以来即为论词者所注意。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感叹：“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在北宋与南宋中间划界，成了词史分期中常见的做法；对其变化因由的探讨，也大多注目于南宋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对于北宋的种种改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样的研究思路自然很有道理，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世情”“时序”的变化虽然可能因政治、经济、战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但社会文化的发展又有其延续性，后一阶段某些显著的现象、特征，往往在前一

阶段就已埋下了种子，生根发芽，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成长。两者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文化如此，作为文化之表现载体的文学同样如此。就词来说，南宋词人对北宋词人其实多有取法，辛弃疾之于苏轼，姜夔之于周邦彦，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南宋词的某些风气之开，往往可以追溯到北宋，尤其是北宋后期。由此，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判断：“渡江遂绝”的“北宋风流”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北宋词，至少在北宋后期，词史的发展存在着一个走向南宋的动向，存在着南宋词风的“暗流”甚至“明流”。继成选择这个课题进行研究，从视角来说，无疑是颇有新意的，可以丰富我们对这段词史的认识。除此之外，采用“微观模式”，以贺铸、周邦彦为中心来考察词风走向南宋的过程，我认为也是具有创新性的做法。程千帆先生曾言：“一位在文学史上能够将自己的姓名显赫地流传下来的诗人，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每每留下了可供后人探索的鲜明的轨迹，而这些纵横交错的轨迹的总和便体现了文学史的基本面貌。”这一观点很值得重视。它启示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我们不仅可以采取由宏观的社会环境、文学风貌及于微观的作家个体的方式，也可由微观达宏观，从作家个体出发来接近文学史的基本面貌，观察其发展流变的总体趋势。目前的文学史书写，大多采用前一种方式，而后一种方式似尚未见多少实践。此书的“微观模式”研究法，是对后一种方式的尝试，成功与否暂且不论，至少思路是值得肯定的。循着这条路径，我们在宋词这块“熟土”上，或许能发现一些别样的风景。

二是观点有启发性。此书以贺铸与周邦彦在成长期所面临的时代与地域文化环境为论述的起点，从北宋后期的政治文化与

“词心”、社会风尚与“词品”、文学思潮与“词体”三个方面展开，最后结合文化环境之变解读贺、周词在南宋的接受史，评定其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全书脉络清晰，紧扣贺、周这个“点”与词史这条“线”以及北宋后期文化这张“网”的关系，剥茧抽丝，层层深入，逐步展现出词由北宋走向南宋的曲折而不失明晰的旅程，体现出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书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对“贺周”并称的重新发现，仁宗朝为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交替的临界点、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交流的平衡期之说，唐宋词的“同雅异质”现象，词体中作为审美范型的“唐音”“宋调”之别，等等，均能于熟中求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突破与创新，颇具启发性。这些观点在校外盲审及校内答辩过程中，获得了专家、评委的一致肯定。以这些观点为核心的相关论文，多发表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业内权威刊物上，其中论词体的唐宋之辨的论文还获得了湖南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继成先后申报成功的湖南省、教育部及国家社科项目，也都与博士论文相关。由此可见，本书不只在研究的视角、方法上有创新，其内容、观点也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值得深入挖掘与精研。

三是材料运用得当。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掌握材料是基础。先师邓乔彬先生一生治学，即以文献学、文化学、文艺学三者的结合为根本。此书从北宋后期文化与词的关系来探讨词风之演进过程，治学的方法正是先师所倡导的。然而，要真正做好三者的结合实在不易。中国古代的典籍浩如烟海，今人的相关论著亦汗牛充栋，而所谓“文化”，又包罗万象，尽管本书对其限定了范围，有具体的指向，但需要涉猎的文献也非常多，十分考验作者

搜集材料、整理材料、运用材料的能力。继成在这方面的表现，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本书材料繁富却梳理得当，定性定量兼备，引经据典恰切。在以贺、周两位词人为考察中心的同时，也关注到北宋后期词坛乃至两宋词坛的大量群体词人，举例丰富，信手拈来，从中可见继成扎实的文献功夫。其中诸如南北文化、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以及贺、周两位词人等论题，历来研究颇多，继成在引述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能时出己见，对某些传统甚至权威说法的商榷与反驳有理有据。另外，将许多与正文有关的史料或者观点作为注释来处理，既扩展了内容，又不影响文气的贯通流畅，这种做法也是比较恰当的。

四是文字畅达优美。在学术研究中，文字表达能力极其重要。写作学术论文，首先当然是要求表达准确，能够清楚无歧义地描述事物、传达观点。但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要真正做到“辞达”，少不了一定的文采，而作为一篇文学研究论文，如果文字毫无美感，更难免有些辜负了美好的研究对象。因为怀着这种执念，一直以来我对闻一多的《唐诗杂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一类的学术美文颇为偏爱，在与学生的交流中经常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欣赏，也勉励他们尝试。当然，要写出这种理性、情感兼备且表达准确、优美的文章，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很不容易做到，既需学力，又要文笔。而如前所述，尽管继成走上学术道路的时间较晚，但他的文笔较好，又兼好学深思，善于质疑，因此他的论文写作一开始就没有“学生腔”，显得成熟和大气。本书即体现了这一点，其行文风格之畅达优美颇惬人意。全书于论说之中偶杂抒情，章、节、段之间不忘勾勒提缀，前后呼应，能放能收，开阖自如，不仅对诗词的赏析颇见

功力，而且对历史的描述及理论的阐释也能融入散文的优美笔调，章节的安排及小标题亦见匠心，可看出作者具有很强的审美感悟力、良好的文字功底以及向学术美文追求的努力。

当然，诚如继成自己所说，这毕竟还是他人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一个阶段性小结而已，尚有不少可以进一步完善之处，远非他所追求的学术目标。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相信凭着他一贯的好学多思，一定能达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治学境界！

言不尽意，权以为序。

赵晓岚

2018年8月10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南北之间：贺铸与周邦彦词创作的文化起点	28
第一节 从故乡出发：贺、周词的地域文化起点	29
第二节 从平衡开始：贺、周词的时代文化起点	53
第二章 进退之间：贺、周的词心与北宋后期的政治文化	86
第一节 朝帝京：贺、周的词心与熙丰时期的政治文化	87
第二节 官冗从：贺、周的词心与元祐时期的政治文化	104
第三节 江南好：贺、周的词心与绍圣以后的政治文化	118
第三章 雅俗之间：贺、周的词品与北宋后期的社会风尚	133
第一节 词辨雅俗：唐宋时期词的雅俗之辨纵横观	133
第二节 雅化背后：贺、周的词品与北宋后期的社会风尚	167

第四章 唐宋之间：贺、周的词体与北宋后期的文学思潮	212
第一节 词分唐宋：词中“唐音”“宋调”辨说	212
第二节 唐宋徘徊：贺、周的词体与北宋后期的文学思潮	231
余 论	257
主要参考文献	285
后 记	297

绪 论

在唐宋词的研究中，北宋词与南宋词之间的差异很早就已引起论者的关注，而词史和文学史论著对宋词进行分期时，在北宋和南宋中间划界也成了常见的做法。由此，引出了词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词在从北宋到南宋的演进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它们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学者们大多从社会文化、创作主体、文学自身的发展等方面去加以阐释说明^①，取得的成果是相当丰硕的。不过，总体而言，在探赜索隐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较多重视南宋，较少关注北宋。南宋词既与北宋词不同，那么从南宋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或词这种文体发展到南宋时它内部的演变要求去加以解释，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如薛砺若先生的《宋词通论》，即从南宋时代背景的不同、文学上的自然趋变及歌词环境有“应歌”和“应社”的区别作为南北宋词风之变的主要原因。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几乎南宋的所有词家，都或多或少处于北宋词人的笼罩之下，几乎每一种风格

^① 刘永济在《词论》中说：“文艺之事，言派别不如言风会。”他所说的“风会”，指“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等，即包括了社会文化的变革、文学本身的发展以及联系此二者的创作主体（人才）等因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9页）

流派，都可以从北宋后期找到它的源头。如辛弃疾之于苏轼，如姜夔、吴文英之于周邦彦，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这种现象提醒我们：词在靖康之前，就已经开始走向南宋了。因此，我们在解释南宋词演变的原因时，实在有必要把北宋时期也纳入研究的视野，至少应该把北宋后期作为一个重点的关注对象。

二是较多偏重时代，较少结合地域。南宋和北宋，不但时代有异，在地理上也有差别。词的产生，既受时代文化的影响，又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而且这两者往往又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共同发挥作用的。然而，大多数文学史或词史论著在述及南北宋词风之变时，重点关注的一般是时代因素，而对地域因素的探讨较少。有些论者虽然也注意到了地域文化对于词的影响，但或者强调的仍是南宋方面的地域因素，或者论述较为简略，未予细致充分的探讨，或者在论析时主要是以一种静态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与词之间的关系，未充分关注地域文化随时代而演变的一面^①。

三是多见群体的观照，较少个体的视角。在论析这段词史演

^① 龙榆生先生曾言：“两宋词风转变之由，各有其时代与环境关系，南北宋亦自因时因地，而异其作风。”南宋前期，“东坡词风之由南而北，复由稼轩挟以归南，转相流播，益以地域土风、民情国势之推移摩荡，复与南渡词期向、张诸家风气相翕合，以造成悲凉感愤、盘礴磊砢之稼轩词派，此又词坛风气之一大转关也。”至南宋中后期，“偏安局定，士习苟安，激昂蹈厉之风，恒触时忌。于是名门世胄，权相遗贤，异轨同奔，极意声乐。池榭亭台之盛，声色歌舞之娱，燕衍湖山，聊以永日。文人才士，既各有所依归，杯酒交欢，联吟结社。于是对于声律之研索，文字之推敲，乃各竭精殚思，以相角胜。其影响于词风者至巨，而关系于世运者尤深。”姜、吴的词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发展起来的。（《两宋词风转变论》，《词学季刊》1934年第2卷第1号）龙先生所论甚当，惜较为简略。另外，当代学者杨海明先生有宋词为“南方文学”之论，但主要是静态分析，在解释词风之演进时虽于地域文化与时代文化均有涉及，但对二者之动态地结合与发展的论述尚未充分。参见其《唐宋词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唐宋词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试论宋词所带有的“南方文学”特色》（《学术月刊》1984年第1期）等论著。

变及其演变原因的过程中，目前大多数论者采用的是宏观或中观的研究方法。宏观研究者，一般是先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词史流变做一个总体上的粗略描述，然后把相关的作家按时代先后排列分别进行讨论。这种方法为许多词史或文学史著作所采用。而所谓中观研究，即截取北宋后期中的某一个时段，对其中的词人群体、词学现象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研究，如诸葛忆兵的《徽宗词坛研究》、彭国忠的《元祐词坛研究》等均为此类研究的典范。无论宏观还是中观，它实际都是一种群体性的研究，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能轻易地看见郁郁葱葱的词人“森林”或是“森林带”，但构成这片“森林”或“森林带”的词人个体与个性却也容易被弱化。因此，有时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词史流变的大致线条，而对词与社会文化各个层次之间的互动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有时，我们又因研究者设定的时段所限，无法完整地观察到词在北宋后期走向南宋的流动过程。

鉴于在这一论题上的相关研究现状，本书尝试以整个北宋后期为中心时段，采用一种“微观模式”去研究词由北宋走向南宋这个论题。所谓“微观模式”，即选择一到两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以他们的创作史和接受史为线索，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研究，细致观察不同时段、不同环境中他们的词在情感、内容、风格、传播和接受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而说明词由北宋向南宋的演进过程。

这种“微观模式”的研究与通常意义上的微观研究（作家作品研究）不一样。通常我们在研究某个作家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他作为一个“点”所具有的形态和特征，而通过这种“微观模式”去研究某一段文学史的演进，重视的是他作为一条“线”所具有的代表意义。打个比方来说，在传统的微观研究

中，一个作家就是一个湖泊，而当我们以微观模式去研究文学史时，一个作家就成了一条河流：它有源头，有支流，有相连的湖泊；它在流动的过程中，会因地理环境、季节气候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或者奔腾湍急，或者宽阔平缓，又或者在平静的表象之下，埋伏着汹涌的暗流。当这条河流足够大，汇集的支流、联系的湖泊足够多时，就以它为主体构成了一个流域。马克思曾经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特殊或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①所以，作为“个体生活”的某个作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反映作为“类生活”的某一个文学“流域”的历史的。诚如程千帆先生所言：“一位在文学史上能够将自己的姓名显赫地流传下来的诗人，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每每留下了可供后人探索的鲜明的轨迹，而这些纵横交错的轨迹的总和便体现了文学史的基本面貌。”^②在以往关于唐宋词作家的个体研究中，我们其实已经注意到：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大作家，他们的风格往往是丰富多样的，是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因此他们的创作史常常被分成几个时期加以讨论。但可惜的是，这种讨论大多止于作家个体，并没有和各个时期的作家群体风格的演变联系起来，并没有从宏观的词史、文化史的高度去分析其风格趋变的意义和原因。而在我们所说的“微观模式”研究中，微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四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123页。

^② 程千帆《学诗愚得》，《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观（个体）、中观（群体）和宏观（总体）之间互相贯通起来了：它由微观入，自宏观出；它以作家个体为中心研究对象，但其目的却是要说明词史在某一时段的演进状况、演进机制。

“微观模式”的研究要取得成功，关键是要选择合适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就“走向南宋”这一论题来说，他们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完整地经历了整个北宋后期，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时代文化的变化对于创作的影响；第二，具有比较典型的地域文化背景；第三，词的成就和影响足够大，能够代表当时词坛的主要风格流派；第四，词风要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既能总北宋词风之成，又对南宋词风具有开启、先导作用。用这四个条件去衡量北宋后期的词坛大家、名家，则完全符合要求的只有两个人：贺铸和周邦彦。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号北宗狂客、庆湖遗老；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这两人生活的年代相近，均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活到了北宋末的宣和年间。他们一个是北方人，一个是南方人，分别具有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背景。而从词的成就和影响来说，他们同为北宋词坛的殿军。贺铸词在宋代有“妙绝天下”之誉，曾因“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的名句而得名“贺梅子”；而周邦彦则被后人誉为“一代词宗”“词人之甲乙”“集大成”“词中老杜”。虽然现在的学者大多以为贺不如周，但宋人如王灼等论词时常并称“贺周”，清人陈廷焯多次将贺、周二入相提并论，近人龙榆生认为贺铸“兼有东坡、美成二派之长”^①，当代学者钟振振认为“贺铸在北宋词坛的地位，虽不可超越苏轼，但与柳、张、晏、欧、秦、周诸家相上下，还

^① 龙榆生《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中国语文学丛刊》1933年第1期。

是当之无愧的。”^①可见二人的词艺成就即使有差距，也不会太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词风方面来看，贺、周二人恰好集结了北宋词的主要风格流派，又对南宋词产生了重大影响。贺铸以词风的多样性见称，“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嫫、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②。其词艳冶的一面，上继晚唐五代的花间词风，下开南宋以吴文英为代表的“四明词派”，“为梦窗、西麓之先河”^③；其词“悲壮”的一面，是苏轼到辛弃疾之间“嬗变的关檄”^④。而周邦彦号为“集大成”，“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⑤，虽然他其实并不能涵盖苏轼雄放旷逸的词风，但集婉约词之大成则基本上没有疑义。另外，从体式来看，贺、周都是小令慢词兼工，而贺集中小令较多，是北宋令词的结响；周集中慢词较多，为北宋慢词艺术的最后高峰。总而言之，若论北宋词到南宋词之间演进的枢纽和桥梁，则非贺、周二入莫属。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本书选择贺、周两位词家与北宋后期的社会文化作为中心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在词的创作以及被接受、被传播的过程中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以期比较清楚、深入地说明词从北宋后期走向南宋的过程。

二

北宋后期，在本书中指从神宗朝到北宋末这六十年左右的时间。

① 钟振振《北宋词人贺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② 张耒《贺方回乐府序》，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55页。

③ 王易《词曲史·振衰》，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④ 钟振振《北宋词人贺铸研究》，第174页。

⑤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册，第3787页。